

## 前 言

这本小書，原在1957年8月完稿，后来随着农村情况的变化，曾作了几次修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是一个新的問題，本書試从农村这个角度来探討这个問題。如果它能对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有一些帮助，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愿望了。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書中錯誤势所难免。請讀者同志們批評指正。

作 者

1957年11月

# 目 录

一、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	2
二、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	8
(一)矛盾的主要表现 .....	8
(二)矛盾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	15
(三)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	20
三、国家和农业社的矛盾 .....	23
(一)国家计划指导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独立经营的矛盾 .....	24
(二)在分配方面的矛盾 .....	29
(三)在价格方面的矛盾 .....	34
(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矛盾 .....	38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矛盾 .....	43
(一)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矛盾 .....	46
(二)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矛盾 .....	54
(三)生产队和生产队的矛盾 .....	57
(四)社员和社员的矛盾 .....	58
(五)社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矛盾 .....	61
五、手工业和农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单干 农民的矛盾 .....	65
(一)手工业和农业的矛盾 .....	65
(二)农业合作社和退社户、社外农民的矛盾 .....	65

## 一、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接着，经过一系列的巨大的努力，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敌我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也就是说，曾经长期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地位，而敌我矛盾便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整个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农村的情况也是这样。

从农村的具体情况来说，土地改革以前，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利害冲突的矛盾。这个矛盾，由实行土地改革而解决了。土地改革以后，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占主要的地位了，但是孤立的、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还不能根本摆脱贫困。要发展生产力，当时有两条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富农要吸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和工人阶级则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矛盾也是对抗性矛盾，由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基本解决了。因此，农业合

作化以后，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也就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人民内部矛盾不同于敌我矛盾，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说来，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六亿人民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正团结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仍然会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在我国人民内部，例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在农民阶级内部，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在国家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往往也会发生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是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敌我之间的矛盾，则是对抗性的矛盾，它是产生于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符合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则必然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两者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敌我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敌我矛盾是敌对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是要采取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的。例如，我们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打倒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做的。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例如，我国对于富农阶级，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和它完全不同，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利益基本一致情况下的内部矛盾。处理这个矛盾，不适用也不应用阶级革命的手段，而应该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

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當然，如果讓人民內部矛盾發展和尖銳化，也會使矛盾的性質轉化，從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為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只要我們做好工作，主動地正確地處理這些矛盾，這種矛盾性質轉化的情況，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防止的。

有一種人，他們對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人民內部也會存在矛盾。在他們看來，人民內部大家都是要打倒敵人，要建設社會主義，大家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沒有什麼矛盾了；在他們看來，只有在敵人和人民之間或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才會存在矛盾，現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給打倒了，帝國主義被趕跑了，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完成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了，我們的社會就不再有什麼這樣或那樣矛盾了；在他們看來，世界上只有一個敵我性質的矛盾，這個性質的矛盾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的，他們不認為矛盾還有另外一種叫做人民內部性質的矛盾。有這種看法的人，就是在一旦矛盾暴露出來時，他們也是把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之間的矛盾來處理，他們把群眾對政府的批評或者不滿，都看作是“敵人造謠破壞”，把所有的“鬧事”，都看做是“反革命的行為”，他們對於這些事情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態度，用對付敵人的方法，用專政的方法來對付人民群眾。在這些人中間，有嚴重的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也有一些人動機是想維護社會主義，但不認識事物矛盾的變化，結果把事情辦壞了，破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損害了社會主義。有名的廣東省化縣建立癡瘋村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有關領導方

面，沒有考慮當地農民的意見，片面地決定在離村庄不遠的地方修建一個瘋癲村。農民提出反對意見，並且願意幫助政府找尋另外一個合適的建村地址，無代價的幫助政府搬遷。但有關的領導同志卻斷然地拒絕了農民的合理要求，完全錯誤地認定這是“敵人的搗鬼”。農民群眾對此表示極為不滿，結隊前來拆毀了一些瘋癲村的磚瓦，表示抗議。這時，公安局長竟下令向群眾開槍，以致打死了五個、打傷了九個農民。當然，國家是絕對不能寬恕這些犯罪分子的，經過法院、群眾的審訊和協商，對有關的人員都作了刑事處理或者其他的處分，首惡分子公安局長判處了無期徒刑。這就是由於認不清人民內部也有矛盾與不懂得兩種不同的矛盾應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而造成的犯罪行為。

另外還有一種人則完全相反，他們看到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缺點表示了這樣或者那樣的意見，表示了一些不滿意，個別的地方發生了一些“鬧事”的事件，便把這一方面夸大起來，認為現在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是深刻得不得了，尖銳化了，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看成或者說成一片烏黑，從而否定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他們沒有看到，或者不願意看到最基本最大量的事實，人民政府、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在取得輝煌的成就。人民群眾對於黨和政府是完全擁護和信賴的，黨和群眾的聯繫是密切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空前鞏固的。但是，他們否定了這鉄一般的事實，否定了共產黨的領導，他們

認為共产党应当“放弃領導”。抱有这种看法的，就必定会滾到右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的。

以上这两种人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是錯誤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有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总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就不應該否認矛盾，回避矛盾，但也絕不應該夸大矛盾的任何一方面。只有勇敢地正視矛盾，揭露矛盾，不含糊地主动地正确处理矛盾，使矛盾得到解决，以推动社会主义事業不断前进，这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

\*

\*

我們說，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經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处于主要的地位，但絕不是說，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經沒有敌我矛盾了。我們只是說敌我矛盾已經从主要的地位轉为次要的地位了。敌我之間对抗性的矛盾还是存在着的。这也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在农村中，我們可以看到：地主階級是被消灭了，但地主階級中一些最反动的頑固分子企圖向农民反攻倒算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存在的；富农階級在分別吸收进农業生产合作社之后，作为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础是被消灭了，但富农階級反抗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还没有完全根絕；反革命分子是基本被肃清了，但还有一小部分潜伏下来，美蔣反动派又派遣和將繼續会派遣一些反革命特务分子回来；这些反革命特务和地主、富农階級中的頑固分子以及农村中的一些坏分子，就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小股力量。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进展，这一小股力量就会越来越孤立、越分化、越削弱，这个社会基础也就

越来越小，以致被逐漸消除。但是，他們終究是社会主义最凶惡的敵人，在平時，他們也可能会裝作馴服和善良的樣子，但一旦他們認為時機一到，就會無遺地暴露出他們那種青面獠牙，無惡不作的猙獰面目，從各个方面來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發起惡毒的進攻。

不久以前，正當我們黨中央發布在黨內進行整風運動的時候，農村的地主和富農、反革命分子就和城市的資產階級右派聯合起來，向人民發起了瘋狂的進攻，弄得滿天黑雲滾滾，陰霾低罩，牛鬼蛇神，水妖龜怪，都一齊出動了。農村中一時邪氣上升，正氣下降，牛鬼蛇神們在預計着“天下將至”，十分猖狂。他們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倒算運動，從農民手里奪回了耕牛、農具和房屋，搶走了農民的家具，甚至把農民從房子里趕了出去，奪去了農民從土地改革中分到的鬥爭果實。象這樣的事情不僅在一個地方發生，而且在各省許多地方都有發生，如廣東省的廉江縣，地主反攻倒算的事情就達到四百多件。該縣雅堂墟在1957年七月間，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件。反革命暴徒楊道華等二十多人，組織了“中國人民定國軍”，於“墟日”殺死了我糧站主任戴義興同志等五人。這血的事實最深刻地說明了，階級鬥爭的火井沒有熄滅，對於階級敵人，我們是不能作絲毫幻想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動統治階級，在被消滅以前都是要作垂死掙扎的，對於階級敵人，必須經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這是敵對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對於這種矛盾，我們必須堅決地採取專政的手段來處理，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強制他們改造，當他們侵害人民利益的時候，就必須給予无情的鎮壓和法律懲治。對敵人的寬恕，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 二、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条道路的矛盾

### (一) 矛盾的主要表现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整个过渡时期中的基本矛盾。农业合作化基本解决了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能够彻底地解决农村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个问题，还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而将会长期存在，并且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斗争。

在全国基本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怎样对待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两个方面，也表现在工农关系和党的领导以及关于农业生产方面（比如要不要服从国家计划，要不要实行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的速度和方针等问题，都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家知道，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两项基本制度，如果这两个基本制度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就要动摇。资本主义就是选中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地方发起进攻。于是，这两个问题，就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战的焦点；社会主义要坚决维护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资本主义要推翻这两个制度，恢复个体经营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

在合作化问题方面，从各地暴露的情况看来，资本主义的

进攻，主要是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搞垮合作社，进行單干，以發展資本主义。他們为了要达到退出和搞垮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目的，就到处說“合作化不好，年年减产了”，又說“入了合作社，收入年年差”，又說“合作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在农業生产合作社里制造怀疑和动摇的空气，然后他們便提出要求退社，甚至串連組織了一批人集体鬧退社，鬧散社，以便达到他們搞垮合作社的目的。例如，广东省曲江县白土乡中乡社的生产隊長岑良元，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自己要退出合作社去走資本主义道路，还串連了十六戶农民和他一起退出合作社。农民称他是“退社組長”。广东省陆丰县有些地方的农業生产合作社，因此而退社的农民，就占有百分之四、五十左右。有的沒有公开鬧退社，但却企圖改变合作社的性質，提出包产到戶的主張，企圖在社內單干。

农業生产合作社真的沒有优越性嗎？办了农業生产合作社以后，生产真的不如單干，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嗎？农民的生活真的一年比一年下降嗎？讓事实来回答这些問題吧。

大家都知道，1956年是我国农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第一年，也是解放以来受到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洪水、内涝、台风、干旱等灾害面积达一亿八千万亩。但是，由于实现了农業合作化，發展了农田水利建設，广泛地推广了各种先进的生产經驗和增产措施，农業生产不仅沒有减产，而且还比丰收的1955年的产量有显著的增加。全国农業及其副業的总产值，如果都以1952年的不变价格来計算，1949年是三百二十五亿九千五百万元，1956年增加到五百八十二亿九千万元，比1949年增加了約80%，比1952年增加了20.2%。全国粮食

的总产量1949年是二千一百六十一亿九千万斤；1952年是三千零八十七亿九千万斤；1956年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达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比1955年增加了4.4%，约二百亿斤左右，比1936年(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年)高出了32.9%，比1949年增加了68%。就以广东省来说，由于在1956年春天基本实现了合作化，秋天，全省数百万亩田虽受到了严重的旱灾（这样严重的旱灾，是数十年来没有见过的。1943年广东也曾有过九十多天没有下雨的大旱灾，该年生产严重失收，有三百多万人被饿死了，仅台山县就饿死了二十万人），但是，1956年，全省不仅没有减产，而且还比1955年增产了二十一亿斤粮食，比抗战前最高产量的一年仍增加五十一亿斤，占27%。全省有70%的社增加生产。1949年，全省的农业总产值约十七亿元，到1952年是二十六亿多元，而1956年，却增加到三十三亿多元了，比1949年增加了90%以上。广东省的连平县，合作化以后，1956年就有90%以上的农民，生活已经赶上中农的生活水平了。

单干真的会比合作化有更多的优越性吗？我们也可以看看下面的几个事实。广东省清远县的龙山区，1956年碰到了数十年来的奇旱重灾，靠着合作化的力量，组织了人力日夜不歇的抗旱，全区终于获得增产，年终分配的结果，有90%左右的社员比1955年增加了收入，平均每个人留口粮五百零六斤。可是该区有另外的四十六户单干农民的情况怎样呢？水稻严重地减了产，没有缴纳公粮，平均每人也只能够分到三百斤的口粮，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少了二百多斤。有一个叫何偉枝的富裕农民，他原来坚决相信单干一定要比合作化优越的，经过这次最

深刻的事实教訓以后，他在自己的門口貼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偉枝入社千年好

單干确实无前途”

表示申請参加農業生产合作社。

广东省陆丰县炎龙乡，在1957年六、七月間，以富裕中农为首掀起了一股退社散伙的歪風，許多农民退出了農業生产合作社，農業生产合作社几乎給搞散了。退社后的情况怎样呢？不到几个月里，原来已經絕迹了的高利貸剝削又鑽出来害人了，有一百三十六戶貧困农民借了高利貸，一百五十六戶农民卖了青苗，三十九戶貧农丢了耕，全乡减产了34%。而該乡依然坚持在農業生产合作社里的一千多戶貧农和下中农，却胜利地度过了灾荒，沒有一戶借債的。

在农村中另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农村的資本主义势力选中了这个进攻的目标，集中地攻击和反对粮食統購統銷。它們到处散播謠言，攻击統購統銷不好。他們說：“粮食統購統銷插着农民的喉，限死农民”，“統購統銷餓死人”，“农民吃不饱，生活越来越苦，不愿意發展生产”，“农民不滿共产党就是因为統購統銷”，等等。把党的統購統銷政策說得杀气騰騰，陰森迫人，要求非取消它不可了。实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究竟是对农民有利还是有害？农民的口粮究竟是不是一年比一年低，生活一年比一年苦？要回答这些問題，最好是看事实，事实是最雄辯的。首先，我們来看看全国农民的生活情况，以全國农民的平均消費量来計算，平均口粮是逐年增加的。

在1949年平均口粮每人只有三百九十六点三斤，但到了

1956年,就有了五百九十二点五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百九十六点二斤。食油1949年是二点九斤,1956年是四点三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点四斤。猪肉1949年是七斤,1956年是七点一斤,比1949年增加零点一斤。棉布1949年是十尺,1956年是十八点三尺,比1949年增加了八点三尺。

再以广东省来说,在解放前是有名的缺粮省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十亿斤左右的大米,那时候,平均每个农民的口粮,一年只有二百到二百五十斤稻谷,农民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三千二百万亩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每年可以免除了向地主阶级交租的四十亿斤粮食。合作化以后,全省粮食大大增产了,1956年全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二百四十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50%,农民的平均口粮,已经达到了五百斤(其中稻谷约四百斤)以上,比解放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广东省英德县的调查资料中也充分说明了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是增加得很多的:1948年,全县农民平均每人一年的口粮是二百八十八斤;1954年是该县大丰收的一年,也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第二年,农民的平均口粮就增加到四百二十斤了,比1948年增加了45%以上;1955年,平均口粮增加到四百五十七斤;1956年,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农民平均口粮又增加到四百九十五斤(以上均不计算杂粮)了,比1954年增加了约16%,比1948年增加了72%以上。铁一样的事实说明: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的农民口粮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加的;农民的生活不是下降,而是逐年上升的。

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和统购的粮食,在全部粮食产

量中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而农民自己消费的比例，却是逐年上升的。以全国的情况来看，1950年国家农业税占全国粮食产量的13%，1953年是12%，到1956年已经下降到10%了。1953年，全国的征粮购粮是七百三十九亿斤，该年供应农村的有三百三十五亿斤，国家实在掌握的只有四百零四亿斤；1954年征粮购粮是九百三十二亿斤，供应农村的三百六十七亿斤，国家实在掌握的是五百六十五亿斤，比1953年是增加了一些；1955年征粮购粮是八百七十六亿斤，比1954年减少了五十六亿斤，供应农村的是三百八十九亿斤，国家掌握的是四百八十七亿斤，比1954年减少了七十八亿斤；1956年征粮购粮是七百五十七亿斤，又比1955年下降了一百一十九亿斤，供应农村的是四百三十二亿斤，国家掌握的是三百二十五亿斤，又比1955年减少了一百六十二亿斤。

广东省的材料也同样有力地说明，统购统销后农民粮食的消费比例是逐年上升的。1953年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第一年，该年粮食总产量中，农民自己消费的占65.3%，征粮占14.7%，购粮占12.9%，农民卖给自由市场的占7.1%；1954年农民消费的是59.7%，征粮占14.3%，购粮占26%，1955年农民消费的是69%，征粮占12.5%，购粮占18.5%；1956年农民消费的占74%，征粮占10.4%，购粮占15.6%。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四年中，农民的粮食消费比例上升了8.7%，征粮比例下降了3.4%，购粮比例下降了（比1954年，因为1953年是在秋收后才开始统购统销的，没有全年的统购数字和比例）10.4%。从广东省英德县的调查资料也充分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全县征粮的数字1954年是四千二百六十三万斤；1955年是三千九

百二十七万斤,比1954年少了三百三十六万斤;1956年是三千六百五十九万斤,比1955年又少了二百六十八万斤,比1954年少了六百零四万斤,减少14%以上。購粮的数字也是逐年减少的,1954年購粮是七千八百三十六万斤;1955年是四千二百四十一万斤,比1954年减少了一千五百九十五万斤;1956年是二千九百六十三万斤,比1955年减少了一千二百七十八万斤,比1954年减少了四千八百七十三万斤,减少了60%以上。

这些事实难道不都是象鉄一样地証明农民的生活在不断的上升嗎?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否認的。

当然,我国当前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粮食消費水平还是不高的,和其他先进的国家比較起来,还是低下的。但是,农民生活水平和粮食消費水平的提高,唯一的途徑是增加粮食生产,如果不增加粮食生产,要更高更快地提高粮食消費水平是不可能的,也是極其危险的。从我国粮食增产的情况来分析,农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說是很高的了,口粮增長率超过了生产的增長率。全国农民平均口粮是五百九十二点五斤,比1949年的三百九十六点三斤提高了27%以上,可是,在同期間粮食的增产比例却是23%,口粮的增長率比粮食增产率超出了4%。广东省农民平均口粮1956年是五百斤,比解放前的二百到二百五十斤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同时期內該省的粮食产量只是增長了50%,口粮的增長率比生产的增長率超过了50%。該省的英德县1956年农民平均一年是四百九十五斤,比1948年的二百八十八斤增長了72%以上,而在同时期內,該县的粮食生产增長率是60%,口粮的增長率比粮食增長率超过了10%。这些事实說明,当前农民口粮的提高已經达到最高的速度了,如

果再提高速度，就只有减少工業和城市的粮食供应，这样就必然要导致工業和城市建設的下降甚至是停頓。这样的方針，是違反社会主义利益的。

粮食統購統銷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保证了缺粮者的口粮供应，全国人民都获得了極大的利益，首先是生活貧困在荒月缺粮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貧农和下中农获得了利益，使他們解除了資本主义囤积、剝削的沉重的痛苦，随时可以得到价格公道的粮食供应，从而就可以安心生产，有利于生产。粮食統購統銷政策有利于工業、农業生产的發展，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設。

上面这些不可爭辯的事实，充分地說明了农業合作化的优越性，說明了統購統銷的好处，那些說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政策不好，是毫无根据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这些問題就是农村中的兩条道路斗争的具体表现。此外，农村的資本主义也攻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攻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攻击共产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这也是兩条道路斗争問題。对于这些問題，我們將要在下面談到，这里就不談了。

## （二）矛盾的社会根源和認識根源

在农民中，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之前，大多数是贊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少数大約10%或稍多一些是严重地留恋資本主义道路，不贊成社会主义的。而到1957年下半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抗拒改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更是極少数了。社会主义是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終地摆脱貧困，走向共同富裕。而农業合作化和粮食



統購統銷，就是決定我國農村是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两个最根本的問題。

在實現農業合作化后，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了几年以后，仍然还有一些農民起來反對社會主義，並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這是有它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的。

在我國農民中，大約有20—30%左右的富裕中農，一部分是土地改革以前就已經是生活好的老富裕中農，還有一部分是土地改革以前的貧農，土地改革后生活富裕了，變成了新的富裕農民。他們生活富裕，生產條件好，有的甚至還有一些剝削活動，他們留戀單干，羨慕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的道路，對社會主義抱懷疑動搖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們也飽嘗了舊社會統治的各種痛苦，因此，當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都踊躍地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他們會看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跟隨着貧農和下中農參加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來。原來的經濟地位使他們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中的動搖派。農民中還有占農村人口約60—70%的貧農和下中農，他們生產資料不足，生產資金缺乏，家底薄，生活有困難，一旦遭遇什么天災病害，就有飢餓破產的危險，因而他們迫切地要求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解決困難，迫切地要求統購統銷政策穩定物價保證生產和生活，他們就很自然成為農村中社會主義最堅定可靠的依靠力量。共產黨所以能夠在農村中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首先就是由於依靠了他們，和團結了中農。

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以后，在農業生產合作社里，主要的生產資料基本上雖然是變為集體所有制了，但是，這並不是說富

裕中农和貧农原来的階級的經濟地位差別的影响就完全沒有了。應該說，这种原来的階級的經濟地位的影响还是异常深刻地存在着的。富裕中农入社以后，他們看到自己的土地比別人的土地多打粮食，畜力农具比人家充足，就觉得和貧农搞在一起自己吃了亏；他們看到农業生产合作社初办起来有些缺点，生产搞得不是很好，一时还赶不上他自己的水平，就觉得合作化不如他自己單干，就怀疑自己走錯了路了；有一些富裕中农在初办社时减少了一些收入，就認為农業生产合作社是一定办不好了；特别是当他們看到在社外可以进行投机的商業活动，圖取暴利的时候，他們中就会有相当的一部分起来帶头鬧退社、鬧散伙，要走資本主义的道路。农業生产合作社剛建立不久，领导和群众都还来不及取得丰富的經驗，合作社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錯誤，富裕中农看到这些，就認為社会主义制度不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了。此外，富裕中农在历史上就有比較多商業关系和剝削关系，因此資本主义对他們影响和引誘力就特別大。特别是因为农業合作化以后，我們在农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严重地削弱了，随着自由市場开放，农村的商業活动活躍起来，原来潜伏在富裕中农階層中的資本主义自發力量，就迅速地猛烈地發展起来了。富裕中农階層就很自然地成为农村資本主义自發勢力的代表。

貧农和下中农的情况則和富裕中农的情况不同。他們由于生产資料占有情况不好，生活有困难，如果一旦农業生产合作社散伙或者是退社單干，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就解决不了。如果一旦取消粮食統購統銷，首先受害的就是他們。他們得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因此他們就坚决地起来保护社会主义，保

損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統購統銷。他們的態度和富裕中農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態度是針鋒相對的。就是這樣，以貧農和下中農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和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鬥爭，就在各個問題首先是要不要合作化和要不要統購統銷的問題上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在這個兩條道路的鬥爭中，並不是所有的貧農和下中農在一開始都站在社會主義方面的，他們中有不少人受到了資本主義言行的影響，又看到合作化也確實存在不少缺點，對新的制度有許多的不習慣，因而在兩條道路鬥爭中猶疑動搖，甚至有個別少數也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在事物和思維的發展中，思想往往是落後於現實的。農業實現了合作化，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了，可是農民，首先是富裕中農的自私心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還沒有得到清除，還沒有能夠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為真正新型的集體農民。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經濟制度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但還沒有完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他們在入了社後，仍然用舊的富裕農民的觀點和立場來看一切的事情，去考慮一切的問題，因而在各種問題上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種根深蒂固的自私心理和資本主義聯結起來，就必然要出現資本主義勢力的泛濫。

這些，便是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還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

但必須指出：實現農業合作化後的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農村中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既可以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表現為敵我矛盾，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前者

是大量的，而后者是比較少数的。我們所以說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因为：第一，代表資本主义势力的富裕中农，他們是劳动者，只有一些輕微的剝削，和剝削階級是有本質上的区别的。在旧社会中，他們也受到反动統治階級的压迫和剝削的痛苦，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和貧农、下中农的带动下，他們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农民是我們党历次革命运动的基本群众（所謂基本群众，主要是指农民中的貧农和下中农，但也包括富裕中农在內），在战争中，他們和我們在一起打倒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統治；在土地改革中，他們和我們在一起打倒了地主階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他們也是我們党的基本群众。不能团結他們，我們党就不能团結大多数群众来进行革命和建設。第三，富裕中农階層，其經濟是和資本主义的剝削經濟有本質上的区别的，中农經濟还是小农經濟，它虽然可能發展成为資本主义經濟，但还没有發展到資本主义經濟。特别是当許多富裕中农都已经参加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組織中的情况下，他們的資本主义傾向是更多地表現在思想問題方面，其次才是实际行动方面。因此，处理这个矛盾，只能够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針，团結——批評——团結，从团結的愿望出發，经过批評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具体一点來說，就是要从巩固貧农和中农的团結，巩固好社会主义陣地（農業生产合作社）的愿望出發，经过批判和自我批判（最好的方式是大鳴大放大爭），克服資本主义思想，在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覺悟，消除資本主义影响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貧农和中农的联盟，巩固合作化。

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水火不相容的，是完全對立的，是對抗性的矛盾。思想是和行動有密切聯系的，思想影響着行動，行動又在影響着思想。如果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取得了統治地位，要建成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如果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取得了統治的地位，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我們在和資本主義思想鬥爭中，是絕對不可以採取調和妥協的態度的，一定要堅決地和資本主義思想劃清界綫，狠狠地毫不留情地將資本主義思想打倒，只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徹底地摧毀了資本主義，富裕農民和貧農才有可能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取得新的團結。才能保衛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 (三)加強社會主義教育

解決農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矛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開展深入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提高農民社會主義覺悟。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我國農村已經基本實現了合作化，但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沒有結束。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地，克服資本主義傾向，在目前有必要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

在農業合作化以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加強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教育，具有極其深刻的革命意義。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農業實現了合作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戰綫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農民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農民的政治思想卻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

来,資本主义的根源还没有徹底挖掉,走資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兩条道路的思想斗争,在农民中間还没有完全解决,不仅上中农存在着資本主义思想,甚至貧农、下中农中間也还不同程度存在着这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不是一个短时期內可以完全解决的。兩条道路的斗争,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是关系到我們社会主义事業的成敗,是关系到我們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的根本問題。但是少数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傾向,是人民內部問題。因此,解决这个問題,就不能采用簡單粗暴的办法,而應該以坚持說理的方針,用摆事实、講道理的方法,开展大辯論,用親身的感受和事实,来充分說明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統購統銷的好处,說明党的各項政策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以打退資本主义思想的进攻,保衛社会主义的成果。同时,在大辯論中,还可教育我們自己,克服資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此,在农業实现合作化以后,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开展全民性的兩条道路的大辯論,其实質就是取得了經濟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要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人們的政治思想。也就是說,社会主义教育大辯論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和最好的形式却是开展全民大辯論的形式。大辯論的形式,就是要在群众中开展大鳴大放大爭运动,讓农民群众把所有心里的話都鳴放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不管它是香花还是毒草,讓农民群众自己来分析辨別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那些是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些是反对社会主义

的，讓农民群众以自己亲身的感受来教育自己。在大辯論中，首先要求在走“資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問題上，弄清大是大非，清除資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至于农民群众中的正确意見，我們也要虛心接受，要坚决地徹底地改进工作，改正干部作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的各个問題，便能提高农民群众的積極性，进一步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

大辯論的形式，是我們党的群众路綫的新發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發展，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形式。我們党是有着执行群众路綫的光荣傳統的，在过去对敌斗争中，由于貫徹了群众路綫，依靠群众力量，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解决了敌我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中，对于如何走群众路綫，却是缺乏經驗的。近几年来，农村工作中，在批判右傾思想之后，往往会發生簡單化和命令主义的現象；在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之后，往往又会發生放任自流的現象。因此就不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錯誤。現在經驗証明，大辯論的形式，是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中走群众路綫的最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法。只要我們能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們就能解决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問題，就能解决领导与被领导、先进与落后、这一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間的矛盾。因此，在开展大辯論时，首先就要讓群众意見能够徹底地鳴放出来，只有鳴放得深透，才能进一步辯透，沒有大鳴大放，当然就无法辯透。只有鳴透辯透，才能提高認識，改进工作。但是我們还應該指出，在开展大辯論时，必須注意加强党的領導，树立領導核心，貫徹农村中的階級路綫。認為在

農業合作化以后可以不用貫徹階級路線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依靠原來的貧農和下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的階級政策，仍是不可動搖的。只有依靠貧農和下中農，樹立貧農和下中農在農村中的領導優勢，才能鞏固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陣地。上中農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中，是有動搖的，有的甚至還有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行為。這些思想行為，和社會主義事業是不相容的，我們必須進行批判。但是由於上中農仍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對其資本主義思想傾向的批判應當從嚴，決不能有所遷就，但在經濟上還應當照顧他們的合理利益，認真執行互利政策，而不應當損害他們的利益。對於地主、富農分子和被管制生產的反革命分子，則要加強對他們的改造，對其中進行不法活動的，要進行堅決的鬥爭，不准他們亂說亂動。我們只有全面的貫徹階級路線，才能在农村繼續經濟戰綫上的勝利之後，而取得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進一步地鞏固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陣地，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地向前發展。

### 三、國家和農業社的矛盾

國家和農業社之間的矛盾，其實質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因而它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沒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所有制關係的基本的一面。我們在研究國家和農業社之間的矛盾時，必須首先肯定這一方面。否則，就會犯錯誤。在另一方面，這兩種所有制也是存在着矛盾的，全民所有



制代表着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長远利益，集体所有制代表着局部农民的利益和眼前利益。因而在处理事情时，两种所有制就会常常有不同的意見和主張，表現着矛盾。在生产水平低，生产赶不上客观需要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就会緊張一些。这个矛盾也同时反映了我国生产力落后和国家、人民客观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因为全民所有制在我們的国家中是处于領導的地位，集体所有制是处于被領導的地位。所以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也就以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的形式表現出来。

下面，我們將分別地談到国家和农業社矛盾的四个主要方面，即：国家計劃指导和农業生产合作社独立經營的矛盾；在分配方面的矛盾；在产品价格方面的矛盾；工業和农業、城市和乡村的矛盾。

### **（一）国家計劃指导和农業生产合作社 独立經營的矛盾**

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是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的。这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基本特点之一。农業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大規模的集体經濟，必須在国家計劃的指导下有計劃地經營生产。几年来的事实証明，国家計劃对于指导农業生产是有重大意义的，保證了粮食生产的發展，保證了工業原料的生产和供应，保證了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普遍上升，进一步地提高了农民对于發展生产的積極性。从而保證了国家和农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巩固了工农联盟。这是农業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最基本的特点。农業生产合作社离开了国家計劃，就要离开社会主义。

此外，我們也要認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另外的一些特點，就是：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經濟是集體的經濟，它是要按照合作社和社員本身的需要進行生產，將一部分的產品出售給國家和市場；第二，農業生產受氣候、雨水、土壤及其他自然條件的影響，地區性的差異很大，在這一個社能夠發展的生產，在另一個社里就不一定能夠發展；第三，農業生產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它的一切活動，就應該既要考慮國家的利益，也要考慮這個小集體的利益。它和全民所有制的工業和國營農場有性質上的區別。因此，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國家不能象要求工廠或者國營農場一樣來要求，要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也要照顧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特點，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保持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經營的獨立性。過去在這方面的缺點，主要是國家計劃工作沒有照顧到這些特點，只強調了國家計劃指導，而沒有或者很少照顧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上的獨立性。概括來說，就是有過高、過死的缺點。所謂過高，就是說有些地方的國家計劃指標要求過高，實際上做不到，失去了計劃指導的意義。比如，廣東省四會縣倉豐鄉第一社只有雙造稻田四千一百五十畝，單造稻田二百五十五畝，旱地四百二十八畝。而國家分配給它的種植面積任務却是：雙造稻四千三百五十一畝，單造稻四百三十四畝，旱地作物七百零五畝。合作社沒有那樣多的土地，怎麼能夠完成國家所規定的任務呢！又如從化縣的生豬生產，1956年該縣共養豬三萬一千頭，1957年縣的計劃是八萬五千頭，比1956年增加174%。這顯然是無法完成的脫離實際的計劃。但領導上卻按照這個計劃來分配給合作社生豬“定購”的任務。結果許多合作社都

不能完成任务，因而有的社吃不到猪肉，有的社不管“定購”任务把养着的猪杀来吃了，影响了生产。所谓过死，就是說国家的計劃規定的项目过分詳細，种植面积規定过死，并硬要合作社机械执行，沒有或者很少留給农业生产合作社独立活动的余地。比如：广东省南雄县下达的国家計劃所規定的种植面积，就占了全县耕地总面积的99%，連社員自留地上該种什么作物也給規定上了。有些地方，对不需要作硬性規定的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作了指令性的規定，如番薯、芋头、木薯等。

这些缺点，必然会影响到国家計劃在指导生产上的意义和作用；不能更好地在国家計劃指导下因地制宜地發展生产，影响农民对發展生产的积极性；过高、过死的而又要求农民绝对执行的国家計劃，又会助長工作干部的强迫命令，农民对国家的不満。

但是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强调生产經營的独立性，就不愿接受国家計劃的指导，盲目的种植产量高利大的經濟作物，追求盈利。这种做法，也就必然和国家計劃建設發生矛盾。

为了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既能在国家計劃的指导下进行，又能够保持它在生产經營上的独立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对發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密切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就要进一步的改进国家計劃工作和加强农民对国家計劃的观念。从各个地方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需要做好下面一些工作：

一，改变过去国家計劃从上而下，層層下达的工作方法，采用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結合，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使国家的計劃能够符合于下面的实际情况，使下面的要

求和意見，能够反映到国家計劃中來。实行計劃的分級管理，是使計劃工作符合下面实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省和專区逐步从現在对各种作物都具体制訂生产計劃，規定生产指标和种植面积的做法，过渡到只規定主要农作物(主粮和主要的工業原料)的总产量、国家的采購計劃和調撥計劃。省、專区兩級下达的粮食作物与主要工業原料(如甘蔗)的种植面积是指令性的，下級必須完成，其他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是参考性的，可以不作硬性規定。县、乡、社可以根据上面的計劃，作出自己具体的計劃。上面的生产計劃对于下面，除了采購計劃和調撥計劃必須执行外，其他方面的指标作为参考，下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适当的机动調整。县以下的計劃应当是具体詳細的，但也不能所有的作物都作硬性規定，須作指令性的作物的指标，也应当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結合起来，领导和群众結合起来，經過充分討論平衡，最后才作出規定。

二，在計劃的方法上，对于不同的作物和产品，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达到既指导生产又不妨碍农業生产合作社生产經營的独立性的目的。对于粮食、油料和生豬，实行“定产定購”的办法；对于其他的主要的工業原料商品，如甘蔗、黃麻、苧麻、木薯、黃烟……等，則可以由国家规定比較詳細的分項采購計劃指标；对于其他杂粮、农副产品、土特产、土葯材等，則可以由农業生产合作社自己作出生产計劃，由采購部門和商業部門直接与农業生产合作社訂立分項的产購合同，用合同和价格政策去指导和推动农業生产合作社有計劃地进行生产。国家在規定合作社的粮食、油料、生豬等定購任务，和規定工業原料商品的分項采購指标时，要深入了解下面的情况，克

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偏高偏低的现象，做到切合实际，使计划建立在真正可靠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完成了国家任务之后，多余的产品，可以由自己自由处理，但国家统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不得流入自由市场。

三，广东省推行了粮、油、猪的包干制度，即国家根据农业社原来的产量与收购任务，今后增产的可能，定出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任务，农业社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多余部分，农业社可以自行支配，以满足农业社和社员的需要。这种制度，既可刺激农业社生产的积极性，又可保证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是解决国家和农业社之间的矛盾的最好办法。

四，除了社员的自留地以外，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中，还要有适当的一部分完全可以由自己安排生产的。有的地方提出这部分土地应占耕地面积的10—15%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和生产内容不同，这个比例也应当可以有所不同。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来规定这个比例。

五，要作好计划工作，还要在领导上，加强调查研究，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使计划切合实际；在下面工作干部中，要认识到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的重要性，批判和克服强迫命令的作风；在社干和农民方面，要教育他们认识到服从国家计划指导的意义和好处，批判农民中只顾自己营利不顾国家计划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使工作干部和农民都认识，只有既服从国家计划指导，又保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独立经营才是正确的。

六，必须坚决地批判少数农民中不顾国家利益，只顾自己利益，不服从国家计划，盲目改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的本位主

义和资本主义思想行为，限制资本主义倾向，使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真正纳入国家计划中来。

## (二) 在分配方面的矛盾

国家和农民在分配方面的矛盾，是在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主要的有积累和消费、农产品的分配、农产品的加工、国家统一收购与自由处理等四个方面。

国家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从各方面抽取一定数量的资金积累。中国是有五亿农民的大农业国，没有农业方面的资金积累，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农民向国家献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积累，一般是通过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农民每年向国家交纳大约相当于自己纯收入7%左右的农业税；另一种形式是在农民将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有一定的价格差额，即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通过这种价格的差额，大约向国家献出了相当于自己纯收入的5%左右，作为国家建设资金积累。两者加起来，大约是占农民纯收入的12%左右。可见农民对于国家建设资金积累方面的负担，是不重的。可是，农业社是集体所有制者，他们常常是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消费；要求国家减少在农民方面的积累，减少农业税的征收；在生产受到灾情时，要求过多的减少征收农业税；要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要求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来减少自己对国家资金积累的负担，提高自己的消费比例。因此，在国家资金积累和农民的消费方面，就出现了矛盾。

在农产品的分配方面，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

要，就必須从农民手里取得大批的农产品資源。国家征收农业稅，获得了一部分粮食資源；同时采用統購統銷的办法，获得了另一部分的粮食資源；此外，还通过統一收購、計劃派購、計劃預購採購、合同收購、市場自由收購等許多的方法，掌握了許多如棉花、油料、甘蔗、黃麻、……等等农产品資源。国家掌握越多的农产品資源，就越能够更好的进行建設。在农民方面，他們从自己消費的需要出發，就經常要求少出售一些农产品，以供自己享用。因此，在农产品的分配方面，国家和农民之間就出現了矛盾。这是生产不足和客觀需要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一个相当長的时间里都会存在的。調节不恰当时，矛盾就会發展起来，比如，1953年因为全国購粮多購了約七十亿斤粮食，农民的口粮少了一些，国家和农民在粮食分配方面的矛盾就緊張起来；又比如，1956年許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收益分配的时候，过多地留下了口粮，沒有执行粮食“三定”政策，妨碍了統購統銷任务的完成，自然是不利于国家建設的。

国家对于主要的农产品，都实行統購統銷和計劃採購的办法；农民則要求有更多的农产品能够由自己自由处理，特别是在自由市場普遍开放以后，农民的这个欲望就更加强烈了，有的农民將国家統購統銷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場去高价出售，有的甚至进行長途販运来取利，更甚的是弃农經商。这样，在农产品的国家計劃收購和农民自由处理的矛盾，就比以前發展了。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农产品分配方面的矛盾，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表現出来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生产赶不上客觀需要的發展；另一个方面是对現有的农产品分配中各个方面

的矛盾。

大家知道，中国農業生产的水平，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普遍实现農業合作化以后，是有很大提高的。但是，中国農業生产的基本情况还是落后的：中国的耕地不多，平均一口人只有二亩多；全国虽然有大約十五亿亩左右的荒地可以开垦，但限于机械和資金力量的不足，目前还不能大規模的进行垦荒；生产关系虽然已經由于实现了合作化而改变过来了，但生产力生产工具方面的落后情况沒有改变过来，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国家工業化水平不高，还不可能实现農業机械化，不能供应更多的化学肥料，只能主要地或者完全依靠自然肥料和人畜粪尿来發展生产；農業的自然灾害严重，全国每年平均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受害，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中，我們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灾害。因此，農業增产的数量終究还是很有限的，远不能滿足国家大規模建設，和人民提高文化、物質生活的需要。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在長期內都会存在的，国家通过分配的手段来調节这个矛盾，不断使生产和需要平衡起来。

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更多更快地增加生产，从根本上改变農業生产方法的落后状态。但是，由于国家工業化水平不高和其他各方面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个根本改变是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的。發展農業生产是極为艰苦的，因此，“今后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机械工業和化学肥料工業，还不能进行很大規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产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



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811页)

另外一个方面,在有限的产品内,通过分配的手段来调节各方面需要的矛盾。这是国家机关经常要作的重要工作,使生产和需要平衡起来,使各方面的需要平衡起来。这种平衡是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它只能保证各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而不能保证充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国家怎样通过分配手段来调节各方面需要的矛盾呢?主要的方法有下面几个:

一,合理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什么是合理的分配比例呢?简单说来,就是能够既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又能够照顾到人民生活的需要和逐渐有所提高的分配比例。在全国的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部分不低于20%或者稍高一点就是合理的。薄一波同志在中共“八大”发言中说:“根据几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我觉得在今后若干年内,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是比较稳妥的。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工业建设高速度的发展,又可以保证我国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如果脱离这个水平太远,不论是增高或降低,都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调,并在政治上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233页)在农业收入中,国家积累部分的比重,要大大地低于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积累比重,只占农民收入的12%左右(另外,合作社自己的集体积累一般占总收

入的5—8%，增产增收的社，则应超过这个比例。因此，这个积累的比例，是合理的。农民也是基本满意的。有少数农民完全不顧国家利益，不愿交納国家稅收是完全錯誤的，应当进行有力的批判。同时还要經常对农民和社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們了解国家积累是为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長远利益，了解局部和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应该服从長远利益的道理，使每个农民都树立爱国、爱社、爱家的观点，能積極完成国家所交付的任务。要时常注意克服农民中可能产生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二，在农产品的分配方面，既要保证国家經濟建設必不可少的需要，又要使农業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得到适当的滿足，互相照顧，各得其所。貫徹这个分配原則，有利工業，有利建設，有利农民，有利生产。当然，要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是要做許多具体工作的，比如：第一，国家的掌握农業产品資源的計劃，要在目前农業的生产水平和照顧到农民的需要方面，既考虑到需要一面，又要考虑到客觀的可能条件。第二，地区和合作社的任务分配要合理，不要畸重畸輕，輕了对国家不利，重了对农民和生产不利。第三，国家掌握农产品資源是通过如征收、統購、派購、預購訂購、合同採購、自由收購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进行的。第四，各种掌握物資的方法要有利于鼓励發展生产，如粮食“三定”“包干”，生猪、油料作物“定产定購”“包干制”等方法，都是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鼓励發展生产的。

三，农产品的加工生产，应当从有利于發展生产来安排。目前，有的工業部門要把农产品的加工过分地集中到城市来，

不能滿足农民对于飼料和肥料的要求，也会造成农村副業生产下降减少，对生产不利。同时也会增加城乡之間的矛盾。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些和农村生产关系密切的农产品加工不适宜于过分集中在城市来搞，除了城市中現有的加工厂如碾米厂、榨油厂、軋花厂……等，应当供应原料外，一般应当在国家指导安排下，有计划地組織給农業生产合作社进行加工。

四，农产品的收購，既要保証完成国家計劃收購的任务，又要允許有一部分的产品由农民自由处理，国家和农民兩利。只有計劃收購沒有自由处理部分，对农民和生产都不利，只有自由处理沒有計劃收購就不利于国家建設。解决这个矛盾，可以采用各种方式，例如，粮食实行“三定”办法，农民完成国家任务之后，多余部分可以自己多吃，对一些主要产品（如生猪、黄烟、黄麻）可以采用派購或“定产定購”的办法，在完成規定任务以外的产品，也可以自己多吃或卖给国家，对一些一般的产品如小杂粮、土特产等，則采用商業部門和农業生产合作社合同訂購或自由收購。

五，对于少数农民不完成国家征購任务，和統一收購政策，私自囤积或販卖的資本主义行为，必須給予严格的批判和禁止。

### （三）在价格方面的矛盾

国家和农民在价格方面的矛盾，主要是表現在农民希望以普遍提高农产品的收購价格，压低工業品的出售价格的办法，来达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目的。我国目前农产品的收購价格是基本合理的。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为了鼓励

农民發展生产，已經不止一次地調整了数十种农产品的收購价格。价格提高的幅度，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基本上克服了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缺点。农产品的收購价格，从1950年到1955年間，就平均提高了10%左右。1956年和1957年又有了提高，仅1955年，农民就因为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購价格而多收入了約二十亿元。1956年和1957年，农民在这方面增加收入的数目就更多了。显然，要求在現在的情况下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購价格，那是很不合理的。国家如果实行單純以提高农产品的收購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那就会得到很严重的后果：第一，必然要影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設。比如，有人提出，粮食价格要比現在提高30%。按照这个意見，国家一年之中就要多付出大約十三亿元左右去掌握同样数量的粮食。这样，每年国家投入經濟建設的資金就要减少大約10%左右（1957年全国經濟建設支出將是一百三十六亿多元，見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报告）。損害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利益。第二，必然要引起物資銷售价格普遍上漲。对全国人民，首先是对五亿农民不利。第三，不利于發展生产。第四，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国家不能采用这个錯誤的政策。

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徑是什么呢？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通过積極努力發展生产，来达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目的。它可以使农民在不断的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不断的提高自己实物消費的水平，可以在正确的社会主义价格政策下，逐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可以更多的交售各种工業原料，支援工業建設，工業又以更多的生产产品来满足人民，首先是农民生产和生活上

的需要；在更多的銷售工农产品中，可以为国家增加資金积累（主要是通过稅收和国家利潤的形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

有些农民提出要以降低工業产品的出售价格的政策，来改善农民生活。这种意見，也是不正确的。要知道，我国現在的工农产品之間价格的差額（即剪刀差），一般說来，是合理的。根据国家有关部門的統計，如果我們以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額为标准来檢查我們今天的工农产品的差价的話，那末，我們在解放以来，剪刀差并没有扩大，反而在縮小着。据調查，全国工农产品的差价如果以1950年为一百，1952年是九十，1955年是八十二了。农产品采購价格如果以1950年为一百，1952年是一百二十二，1955年是一百三十五了。从广东省信宜县的調查材料中，也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没有發展的，有不少是縮小的。如煤油一百斤1951年可換谷一千一百一十斤，1956年換谷八百八十八斤；龙头布每十丈1951年可換谷四百零五斤，1956年換谷四百四十九斤；鋤头每百把1951年可換谷二千二百斤，1956年換谷一千二百八十七斤；机白糖每百斤1951年可換谷一千一百七十九斤，1956年換谷九百一十八斤；五羊牌电池每百对1952年可換谷七百九十斤，1956年換谷七百一十四斤。应当指出，工农产品价格保持一定的差額，特别是提高一些奢侈消費品的价格，是完全必要的，是国家积累資金不可缺少的一项政策。国家通过这项政策取得資金来建設社会主义。

当然，我們也不否認，国家在农产品价格工作方面，也是有不少缺点的。这些缺点，比較集中地表现在农产品的購銷差

价太大、地区之間的差价太大和收購部門或者商業部門工作干部的作風不好等三个方面。

农产品的收購价格和銷售价格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的差額，是完全必要的。国家通过这种差額价格，吸取一定数量的資金积累，来进行国家建設。沒有这种差額，是不利于国家資金积累和国家建設的。但是，如果这种差額太大了，特別是在产区的購銷差价太大了，就要影响农民生产的積極性，影响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国家在处理这个矛盾时，是从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原則出發的。在产区，尽可能縮小該种产品的購銷差价，国家少賺一些錢，或者是由产区农民首先留下規定数量的自用部分，然后将余出部分产品出售給国家，以后产区农民在产区購用該产品时，差价縮小一些。在銷区（多数是在城市），則适当的提高这种差价，以保証国家資金的积累。

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家仍然不可能实行商品全国统一价格（象圖書价格那样），保持一定的地区之間的差价，还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种差价太大了，就会对發展生产不利，扩大城乡之間的矛盾。目前，由于存在着商品的地区差价太大的情况，因而引起了一些农民的不滿。特別是在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山区，这种不滿情况就比較严重。比如，广东省信宜县的县城，一担谷子可以卖到六元九角；在該县交通比較方便有公路可通离城一百里的山区錢排乡，一担谷子卖六元三角，和县城的差价还不太大；而在交通不便的排沙乡，一担谷子就只卖五元，和县城比較起来，差額达38%。而在工業产品方面，則是相反，越往山区交通不便的地区，价格就越高。这两种地区差价

过大，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国家和农民的矛盾就会發展起来。国家在調节这方面的矛盾的时候，重要的方法是坚决地合理地精簡机构，减少商品流轉的中間环节，减少商品的流轉費用；改善經營管理，减少貨物損耗，降低經營管理費用；合理地确定各种商品的不同的稅收和利潤政策，照顧偏遠地区，商品調运，采用从产区到銷区直接分散調运的办法，减少中間費用，等等。从多方面来縮減地区差价。

收購部門和商業部門工作上的缺点，和工作干部工作作风不好，也会增加农民的不满，使国家和农民的矛盾發展起来。比如：有些部門在收購农产品时，不合理地規定过多过細的等級，如茶叶收購甚至达到几十个等級之多；有的地方在收購农产品时压級压价，或者价格变化頻繁；商業部門对暢銷高利的貨物互相搶爭收購，对一些滯銷利少而农民又極需卖出的貨物，則互相推諉不予收購；或者是工作干部态度惡劣，作风不好……等等。都是需要加以解决的問題。

#### （四）工業和農業、城市和乡村的矛盾

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乡村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工人和农民生活差异的矛盾。

有人說：“農業劳动沒有工業劳动重要。”或者說：“農業劳动沒有前途。”这种說法对不对呢？是不对的。我們知道，國家沒有工業化是不行的，工業劳动重要，同样，國家沒有農業生产也是不行的，沒有農業，也就不可能建設成工業，沒有粮食、原料，沒有工業品的市場，怎么能够實現工業化呢？目前，在国家工業全部总产值中，用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就占了約

50%左右；用农副产品和农业原料制造成的工业产品，在国家内部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占了90%左右，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占了70%左右。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就象人的左右腿一般的，同样重要。

有人说：“农民生活太苦了，工人生活太好了，工人的生活和生活距离太远了。”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全国到处的事实已经证明，解放以来，我国不论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是有很大的改善的。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如果都以1952年不变价格来计算，1936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一年的消费额，是六十一元二角；到了1952年，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全国农民平均每人一年的消费额，则是七十二元，比1936年增加了17.5%；到了1955年，农民每人一年平均消费额是七十八元九角，比1952年又增加了9.6%；1956年，农民平均每人一年消费额已经提高到八十一元，比1955年又增加了2.7%，比1936年则提高了32%。工人的生活也是有改善的，根据同上述的调查，1936年全国职工平均每人一年的消费额是一百三十元；到了1952年，职工平均每人一年的消费额，就增加到一百五十一元，比1936年增加了16%；1955年，职工平均消费额是一百六十四元六角，比1952年增加了8.6%；1956年，职工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七十九元六角，又比1955年增加了9%，比1936年增加了38%左右。从上述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从历史上就有了的；1936年，职工的平均消费额等于农民平均消费额的2.12倍；1952年则是2.097倍，比1936年减少了；1955年是2.086倍，又



比1952年减少了一些,1956年是2.217倍,因为該年实行工資改革,职工的工資有所提高,因而距离有所扩大。从1936年到1956年二十年中,职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8%,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2%。由此可見,解放以来工人生活的改善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速度是差不多的,工人和农民生活的距离也沒有扩大,和抗日战争前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从貨幣的統計来看,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高出一倍左右。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說: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好得很多了呢?我們認為不能够这样說,因为工人生活在城市,农民生活在乡村,而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这是由于我国現在的农業生产,是帶有很大的自給性的,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大約有60%左右是自己消費掉,很多日常的生活用品用不着拿錢去买,因而生活費用就节省得多。而城市的生活則不同,一切的用品都得拿錢买,样样都得出錢,因而費用就大得多。据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譚震林同志的調查,湖南省攸县大兴合作社社員李裕芳1955年全年所消費的大米、地瓜、油、鹽、猪肉、豆腐、糖、菜、煤球、布、袜子、麻、套鞋、房租水电、医药費、生产費等,共合人民幣三百零一元,如果將李裕芳所消費的那些东西同样那样多,以北京的价錢来計算,那就要付出七百二十八元八角六分,比湖南省攸县的支出多付出了一倍还要多,其中大米高出90.5%,地瓜高出200%,油高出6%,鹽高出33%,猪肉高出60%,房租水电在乡村只要一元,在北京却要七十二元(參看农村工作通訊1957年第4期,譚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由此可見,工人的生活 and 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是差不多的,相差不太

远的。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应当不应当有合理的差别呢？肯定的說，这种合理适当的差别是应当有的，而且不只是現在会有，在今后一个很長的时间內也会有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国家是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則进行分配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在目前阶段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差别，就是具体地体现着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的差别，因而在生活收入上应当有所差别。工人的劳动，一般是和現代化的机器結合在一起的，需要有技术、文化和管理水平，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据統計，全國工人平均每人在1956年創造的产值是九千元，如果除掉購置原料等費用，純产值每人平均七千元。而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資，大約是七百元左右。这就是說：工人在劳动創造出来的財富中，自己只得到10%左右，而另外的90%，是交給国家，作为資金积累建設社会主义去了。农民的劳动却是和工人的劳动有很大区别的。由于我国生产水平落后，农業劳动仍然处在簡單的手工劳动的情况，沒有机器，也不用有比較高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低。比如，全国今年农副業总产值大約可以达到五百八十亿元，全國农民共有一亿一千万戶，平均一个农户制造出来的产值只有五百二十七元。而农民交給国家的，却只占农副業总产值的10%左右，90%左右是农民自己消費或者用在生产上了。工人的平均創造产值比农民的平均創造产值高出了十二倍以上，工人交給国家的比农民交給国家的要高出几十倍到一百倍。广东省有一个很好的統計資料，該省十七家糖厂，1957年交給国家的税金和利潤，共达一亿二千

萬元，大約相當於全省三千萬農民一年農業稅的66%。“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工人和農民生活上的合理差別正是體現着這個原則。

工人的勞動報酬，是以工資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農民的勞動報酬，是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紅為主要形式表現出來的。這是因為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兩種生產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所決定的。工廠是全民所有制的，它的產品和價格，都是完全歸國家統一掌管的，增產愈多，國家的收入就愈大，在提高國家利益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工人的工資得到合理的適當的增長。農業生產合作社是集體所有制，農民的勞動收入是否增加，首先並不是決定於國家，而是決定於農業生產合作社自己有沒有把生產搞好，有沒有增加生產。當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增長的時候，農民的收入就增加，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減退的時候，農民的收入就會隨着減少。農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唯一正確的途徑，是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發展農業生產，其他的辦法是沒有的。在農業生產上的集體所有制還沒有改變為全民所有制以前，工人和農民勞動報酬和生活收入上的差異還是必然要存在的，而這個所有制的變化，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是要到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才可能實現的。

此外，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收入有所差別，還因為工人生活在城市，在城市中生活費用比較高，根據許多調查材料，要比農村高出一倍左右；農民生活在農村，有自己的房子，糧食、蔬菜……等都是自種自吃，生活費用比城市要低一半左右。由於城市和鄉村生活條件上的差別，而在規定工人工資的時候給

予較高的貨幣收入，也是合理的。

現在有些人說“工人生活在天堂，農民生活在地下”，說“工人農民不平等”，對工人生活比農民生活稍高一些不滿意。究其根源，是來自兩個方面的：一是在農民中有相當普遍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種思想不認識到工業和農業勞動條件上的差異，不認識到工業是複雜勞動和農業是簡單勞動的差別，不認識到兩種勞動在性質上的差別，不承認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種思想是極有害的，會促使勞動生產率的下降，促使生產力的倒退，因而招致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破產。它不能促使社會進步，只能促使社會后退。因而，我們必須堅決反對。許多農民由於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對工人生活稍高一些不滿。必須進行廣泛的宣傳和解釋。另一個方面，就是在工業勞動中，有一部分簡單勞動，如一些雜工、簡單搬運工等工人的工資，特別是有一小部分鄉村工人的工資規定過高了一些，比農民的生活懸殊比較大，因而引起農民的不滿。這種不滿是正當的。這是工資工作上的缺點，這個缺點是不利於工農聯盟的。這個缺點將會得到克服改進。

#### 四、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的矛盾

農民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就開始了農民歷史上新的一頁。從舊式的個體小私有者，變為一個新型的生資料集體所有制的集體農民。在集體農民中，階級被消滅了，所有的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農民之間，開

始建立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劳动是决定一切的，誰劳动得最好，誰就能够得到最多的收入，过最好的生活，受到人們的尊敬；誰不愿意参加劳动，誰就得不到起码的收入，并且受到人們的卑視。农民为共同的目标——建設社会主义、建設集体經濟而奋斗，为共同的利益、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努力工作。这使他們將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团結一致。他們彼此之間沒有根本性質的矛盾。这种农民和农民之間的关系，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并不是說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农民彼此之間就不会存在任何矛盾了。我們是說，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农民互相間沒有根本利益的矛盾，在这方面，他們是一致的；非根本性質的矛盾則是存在的，并且会長期存在的。这些矛盾將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人們自覺主动及时地調节处理，使矛盾获得解决，使集体經濟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不断的發展和完善。当然，如果人們不善于主动自覺地發現和解决矛盾，非根本性的矛盾也是有可能會轉化成为根本性的矛盾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农民間还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認識根源的，用不着奇怪的。我們知道，农业合作化制度在我国建立才只有一年多一些的时间，它需要有一个巩固的过程，这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多少時間合作社才能巩固呢？毛主席說：“根据許多合作社發展的經驗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時間。”他又說：“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計劃期內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計劃期內合作社能得

到巩固，那就很好了。”（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合作社新建立起来，必然要有許多缺点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初期缺点必然是很多的。合作化也是这样。缺点就是矛盾，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就是解决处理矛盾，缺点被克服了，矛盾就被解决了。另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性質的农業生产合作社里，也不可避免地要有人們所处的社会地位不相同的情况。这是因为它是一个集体，就必须要有一些人出来負責领导工作。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們中有一小部分处于领导的地位，大部分的人处于被领导的地位。领导者掌握着集体的全面情况，在处理和决定事情的时候，从全面的需要和整个集体的利益出發，被领导者不了解全面情况，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处理問題时就往往只从个人的利益出發。这样，就必然要产生一些矛盾。最后，我們也不能忽視另外一个现实的情况，那就是：合作化以前，农民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經济地位是不相同的，有的是經济上比較富裕的上中农，他們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时往往不是很自愿，“大势所趨”“随大流”进来的，他們是社会主义的动摇派，留恋着資本主义；有的是經济比較貧苦的貧农和下中农，是合作化的核心和依靠，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此外，还有一些手工業者、小商販等也参加了农業生产合作社，他們又有原来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經济地位。农業生产合作社建成以后，这些以前的社会地位的差別基本是被消除了，經济地位的差別也將跟着生产的發展而逐步的消除。但那些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們腦子里的旧的思想意識，却仍然要存在很長的时间的。这些旧的社会意識就必然会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矛盾，对社內处理各种事情时，彼

此之間便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認識和态度。上述这些，就是农業生产合作社內部矛盾的社会根源和認識根源。

从目前各地所暴露的情况来看，农業生产合作社內部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矛盾。就是：社和社員，也就是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社和生产队，也就是合作社整体利益和生产队的局部利益的矛盾；生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穷村和富村农民的利益矛盾；社員和社員，主要是上中农社員和貧农、下中农社員的矛盾；社干部和社員，也就是社內領導与被領導的矛盾。下面，我們將分別地談到各个方面的矛盾及对其处理的意見。

### （一）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

在农業生产合作社里，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农民把这两者的关系說得很好：“大河水漲小河滿，大河水低小河旱”。农民把集体利益比作大河水，把个人利益比作是小河川。当集体利益日益發展的时候，农民个人的利益也自然就会增加，当集体利益受到損害的时候，农民个人利益也就会减少了。集体农民的經濟收入，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是来自于集体經濟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作为輔助收入地来自于个体經濟。社員个人的經濟命运，已經和合作社的集体經濟联結在一起了。

但是，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还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合作社比較多地注意到全面的利益和長远的利益，而社員个人却往往比較多地要求滿足个人的眼前利益。因而这个矛盾，就集中地表现在長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方面。

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农业社的收益分配问题，社員劳动纪律问题，集体副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问题。

收益分配问题，是生产关系内部的问题，也是各方面利害关系最集中的问题。分配工作做好了，可以顺利地调节各个方面的矛盾，生产关系就会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分配工作做坏了，各方面的矛盾就会发展尖锐起来，甚至引起闹事、散伙的发生，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过去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闹事、散伙，多半是由于收益分配工作做得不好引起的。对于所有的农民来说，他们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给他们带来比过去有更多的收入，能够过比过去富裕的生活。如果一旦这个希望不能达到，那社員就很难自觉来维护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表示怀疑，甚至闹事。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日益增长，是增加社員收入改善生活的物质保证，没有这个物质基础，要增加社員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力增加生产，是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首要任务。但这丝毫不是说，收益分配就不重要了，许多的事例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使是增产了，如果分配不合理，社内各方面的矛盾仍然会发展和尖锐起来的。

收益分配的中心问题，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就是分多分少的问题。所谓积累问题，就是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收益中，留下多少来作为资金积累，以备来年或者以后扩大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积累通常是包括国家积累和集体积累两个部分，国家的积累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这里所说



的只是指農業生产合作社本身的資金积累問題。这种积累,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是以扣除公积金为基本形式的(公益金也是一种积累,但这种积累不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社員們的公共福利、文化娱乐、社員救济等方面的)。所謂消費問題,就是說農業生产合作社在总收益中,拿出多少来分給社員消費。分配中的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問題;积累是集体的長远利益,消費是社員眼前的利益,如果积累多了,虽然有利于社的扩大再生产与提高生产水平,但社員消費部分就少了,社員的眼前利益就要减少;如果消費部分多了,积累部分就少了,集体經濟扩大生产的能力就要减少,集体的長远的利益也就减少了。怎样正确地确定收益分配中的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呢?不論在那一个農業生产合作社里,有一个原則是要遵循的,那就是确定分配的比例,必須既有利于扩大生产發展集体經濟,又要使社員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在社員的收入逐漸有所增加的基础上来进行資金积累,以增加积累扩大生产来保証社員生活的逐步上升。党中央在考察了許多農業生产合作社的經驗以后,曾經指示各地農業生产合作社,在收益分配中,要有占总收入約60—70%的分配給社員,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一般可以占5—8%。这个比例,是适合于全国的情况的。从1956年許多農業生产合作社执行这一指示的情形看,执行这个比例是可以正确地解决积累和消費比例的矛盾的。但必須同时指出,各个農業社的具体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有巨大差別的;有的合作社增产,有的合作社减产,又有的合作社保产,而在增产、保产、减产社中,又有程度不一的差別。因此,如果認為只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就可以正

确地解决全国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那就不正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规定自己当年分配的比例关系，才能正确地执行中央指示的精神，有效地处理社内各方面的利害矛盾。在增产很多或者比較多的合作社，集体的积累就可以适当的提高，一般的可以留到8—12%，增产特別多的社，可以留到20%左右。而对于沒有增产或者增产很少的合作社，公共积累部分則可以降低一些；对于减产的合作社，为了照顾社員的生活，也可以在当年內少留或不留公共积累。应该指出，集体經濟的壯大是农民富裕的泉源，在合作化二年来社員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高之后，多增加些积累是必要的，可能的。

在处理收益分配中积累和消費的关系，有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一种倾向是片面地过多地强调集体利益公共积累，不适当地多留了公积金，以致使社員消費部分过分减少，社員减少收入，甚至引起生活上的困难。比如1956年春，广东省在春收作物分配中，有一些合作社公共积累竟高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分配給社員的只占百分之四、五十，因而严重地影响了社員的積極性。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地强调要社員增加收入，把“少扣多分”的方針誤解为“分清分光”，結果虽然合作社是增产了，但不留任何的公共积累，影响了生产的發展和公共經濟的巩固，有时还会帶來生产水平下降的惡果。比如，广东省南雄县的里崗村合作社，1956年上半年增产，社員的收入平均增加了20%，但該社仍不留一点公积金，甚至还把國家貸款約四千元也分給社員了，結果虽然90%以上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但合作社的生产却遭受到严重的困难。这两种倾向

都是要批判和防止的。

收益分配的制度和办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問題。在試办合作社的时候，一般的合作社只是根据生产收成的季节，一年中只作兩次分配（夏收預分和年終分配），結果社員沒有日常零用錢，生活不方便，有很大意見。1956年有許多合作社实行多次分配的办法，社員表示很欢迎，解决了他們生活上缺少零用錢的問題，也刺激了社員生产的積極性。但又出現了一种分配过多，把合作社的資金都分光了，發展生产有困难；或者分配次数过多，合作社領導整天忙于分配、算賬，影响了对生产的領導；社員平时分錢过多，年終分配結算时剩錢不多，增加了来年度荒的困难，社員也不滿意。現在看来，合作社需要建立一种“定期按劳預支、年終分配結算”的制度。一年中定期按劳預支若干次（比如五、六次），到年終作分配結算。既可以避免因分配次数过多而引起經營管理上的麻煩和混乱，又可以避免分配次数过少的缺点。合作社进行收益分配，要發揚民主，走群众路綫，不要由几个干部包办分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农業生产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也表现在社員劳动紀律問題方面。合作社为了巩固和發展集体經濟，就要求所有的社員都能够自觉地参加生产，严守劳动紀律，爱护公共财产。但有許多社員，由于他們是剛从小私有者轉变为集体农民，小私有者的自私心理和个体經營的散漫習慣，就很自然地被帶到合作社来，常常發生違反劳动紀律，侵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在合作社建立初期，这种事情就会更多一些。建立和严格劳动紀律的过程，就是集体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小农的个人主义斗爭的过程，也是农民从旧的品質逐步改

造为新的品質的过程。因而农業生产合作社在劳动紀律方面的工作,是需要極耐心細致的,而不能有任何粗暴的。社員違反劳动紀律的情况大致有:不積極参加集体生产活动;劳动中窩工浪費;不服从調动;工作質量不好,騙取工分;不爱护公共财产;不爱护耕畜;貪污浪費;假公济私等。为了巩固和發展集体經濟,就必須和这些現象作坚决的斗争。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章程中規定:

“第三十八条 农業生产合作社社員必須遵守以下的劳动紀律:

- (一)不无故曠工。
- (二)劳动的时候听指揮。
- (三)保証工作的質量。
- (四)爱护公共财产。

对于違反劳动紀律的社員要进行教育和批評。如果情节严重,可以分別情况,給以扣减劳动日、賠償損失、撤銷职务以至取消社員資格的处分。”

这个規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当然,农業生产合作社还需要作許多工作来維護劳动紀律,如:第一,严格批判資本主义思想,組織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批評运动,对于積極劳动的給以表揚和獎勵,对于不劳动的給以批評或应有的处分,使每个社員都認識到劳动是光荣、豪迈的事業,而不劳动是可耻的;第二,貫徹“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則,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結合起来,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通过个人的物質利益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的兴趣;第三,健全各种生产責任制度,消灭生

产和公共财产保管方面的无人負責現象；第四，健全公共财产的管理制度，遺失和故意损坏公共财产的要賠償，貪污和破坏者要懲处；第五，健全合作社的監察委员会，領導全体社員和破坏劳动紀律、損害公共财产的現象作斗争；第六，耐心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社員都知道为什么要开展劳动竞赛，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社員都知道严格遵守劳动紀律和保护公共财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全体社員自己的利益。

最后，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的矛盾，也表现在集体经营副業生产和社員经营副業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的发展，目前还不能充分地解决农民全部生活所需。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一方面要大力地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合作社巩固发展和全体社員共同富裕的保证；在另外一个方面，又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社員家庭副業生产，作为一个輔助收入。这种輔助收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也是必要的。集体经营副業和社員个人经营副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两者之間互相結合起来，否則两者之間的矛盾就会发展和尖銳起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家庭副業的收入以不超过社員总純收入的30%为宜。而且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家庭副業的比例也必然越来越小。个人经营副業太多了，就要影响到集体经济的发展 and 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瓦解的可能；个人经营的副業太少了，不要影响到农民不能增加收入，影响到生活上的困难，引起农民的不滿。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有一个原则是要遵循的，那就是，必須优先发展集体副業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同时从当地的历史习惯情况出发，适当发展家庭副業，作为社員的輔助收入，使

兩者之間统筹安排，各得其所。在具体的安排上，因为各地的历史情况和經濟情况不同，处理的办法和其比例关系，也应该有所不同。从广东省的情况看来，大致可以作如下具体的安排：凡是屬於經常需要整天劳动或者全劳动力去經營的，大宗的，产值高、收入大的副業生产和經濟作物生产，都应当由農業生产合作社来統一集体經營，例如加工業方面的碾米、磨坊、榨油、制糖、造紙、磨豆腐、制腐竹等；运输業方面的牛車、手推車、單車、放木排、放竹排等；各种采矿，采集業方面的勾松香、采大宗的土葯材等；砍伐的伐木、鋸木、燒炭、大量的刈茅草等；畜牧業的养群牛、群羊、群猪、群鵝、群鴨、群鷄、养奶牛，大宗养魚、养蜜蜂，大宗的捕魚、捉蝦、打獵等；手工業方面的銑工、木工、泥水工、車衣、大宗的編織竹器、燒石灰、燒磚瓦、打石等；經濟价值高的特种作物如香茅草、蒲草、蒜头等，大量的果树、菠蘿、香蕉等。这些都是应当集体經營的。農業生产合作社在經營各种生产的时候，要很好的注意解决好農業和副業劳动之間的互利問題。凡是屬於零星的，小量的，不須要經常用整天的劳动和全劳动力去經營的副業生产，可以作为農業生产合作社社員的家庭副業生产。例如养猪、养鵝、养鴨、养鷄、养羊、养兔等，零星的手工業如編織竹器、做抽紗、綉花等，少量的捉魚、捉蝦、撈蜆、摸蚌等，少量的刈茅草、刈山草等，少量的砍柴、挖采土葯材等，都可以由社員个人去經營。

为了保証集体經濟的發展和巩固，農業生产合作社还应当規定每一个男女劳动力在一年中最少要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作为每一个社員的基本义务，如果没有完成这个义务，就要受到一定的处分。

## (二) 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矛盾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矛盾，基本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統一經營和生产队独立作用的关系問題。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集体經濟，因此它必須有集中統一的領導、計劃和各种管理制度，才能保證集体的巩固而不致涣散和瓦解。生产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劳动組織，它必須服从社的領導和調动，在生产上保證完成合作社所交的一切任务；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它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組織劳动管理生产的基本單位，它除了服从社的計劃、制度和領導之外，还必須有适合于自己生产队土地、水利、劳动力、資金……等情况的計劃和安排，它必須同时又对全队人員的劳动、生产、生活收入等各方面負責任。因此，必須在合作社的統一领导下，保持生产队的独立作用，才能把社、队的積極性都調动起来，更好地發展生产。以前，在这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过多，抓得过細、过死，对农副業生产，从計劃、种植面积、产量、耕作措施、經營項目、劳力安排以及财务工作……等等一切都由社来規定执行，不給生产队自己調整的权力，劳动定額規定过死，不适合生产队情况的也不許生产队調整；獎罰制度規定过死过細等。这种过分集中的办法，有許多缺点，社給生产队的生产計劃、任务往往不符合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因而計劃、任务落空的危險性很大；生产队領導的積極性調动不起来，不能發揮生产队的独立作用，影响了生产的發展。

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原則，是要坚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集中領導和統一經營，在不影響統一領導的原則下，給予生產隊有比較多的獨立處理問題的權力。最好辦法，就是要建立統一經營、分級管理、明確分工、個人負責的管理制度。建立這個制度，好處很多：一，可以大大地發揮全體社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展生產；二，可以在生產管理上及時地發現問題，並且能夠得到處理解決；三，可以使社幹部減少事務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能夠集中比較多的精力去考慮比較重大的問題，參加生產去領導生產；四，生產隊領導有了。一定的權限，便既能服從社的統一領導，又能發揮隊的積極性。

社和生產隊應當怎樣來分級管理呢？這對於我國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問題，各地都正在摸索中。從各地方的初步經驗看來，社、隊分權，分級管理可以從農業生產、副業生產、財務管理、勞動管理和收益分配等五個方面來進行。

在農業生產上，全社的長遠的生產規劃和年度生產計劃，必須由社統一制訂。但制訂計劃的做法，可以由社首先提出大體要求，然後由各個生產隊先行擬定，最後由全社統一平衡來制訂。各個生產季節的生產計劃，則可以由各個生產隊自己制訂，由社管理委員會批准以後執行。各個生產隊（組）的小段作業計劃，則由生產隊（組）自己擬定。在生產計劃中，社管理委員會應當對生產隊規定主要作物的種植種類、種植面積、產量指標、生產投資、生產基本建設的要求等，生產隊應當堅決執行完成。其他的生產活動，只要是不影響完成合作社所規定的生產任務，生產隊都可以自己安排進行。生產的技術和耕作措施，管理委員會只對主要的措施作出規定以外，生產隊可以靈活執行。農業生產上社、隊分權，分級管理的好辦法，是實行生



产上的包工、包产、包成本(这个成本不包括劳动,只包括生产上的开支)的“三包制”。这个办法,已经正在全国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了。“三包制”就是管理委员会将每年(有的提出三年不变)或者一次收成所需要的劳动日数(包工),应当完成的产量任务(包产),生产成本的开支数(包成本)规定给各个生产队。生产队要保证完成社所给的“三包”任务。实行这种“三包制”,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统一领导,还可保持生产队在生产安排、增产措施、劳动管理、资金使用等各方面的机动权力,并且在物质利益上还可提高社员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兴趣,使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在副业生产上,则主要是合理分工的问题。凡是有利于全社统一经营的副业生产,应当归全社统一经营。凡是有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生产,则可以由生产队负责管理;生产队在完成了社所分的生产任务以后,也可以在不影响全社统一经营的农副业生产的原则下,自己经营一部分副业生产,自负盈亏,收益归生产队自己分配(也可以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利公共积累)。但这种生产的数量不宜过多。

在财务管理上,社、队也要分级管理。全社的财务收支计划,比较大宗的收支款项,由社统一管理。生产队也要有自己的小开支计划,生产队的小财务计划由队提出,经过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执行。属于“三包制”中“包成本”的款项,开支的批准权可以下放到生产队,队长批准,经会计员核对后支付;“包成本”以外的开支,则要按照社章的规定,根据款项的大、小,分别由社主任、管理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讨论批准支付。

在劳动管理方面，社、队也可以分級管理。劳动定額和劳动报酬的标准，应当由合作社統一規定；生产队在不超过“三包制”包工总劳动日数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作某些調整和补充。日常的排工工作，完全由生产队自行处理。

在收益分配方面，全社的預支和分配制度，以及分配方案，都必須由全社統一制訂。但对于生产队包产超額獎勵部分和生产队自己經營的副業收益部分的分配办法，則可以由各个生产队自行决定。

### （三）生产队和生产队的矛盾

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穷村和富村的矛盾。其次是生产队之間本位主义、互相不信任的矛盾。

穷村和富村間的矛盾，是因为農業生产合作社的規模大，一个社往往包含了好几个自然村的农民。自然村和自然村之間原来的生产条件和經濟情况往往是有差异的：有的村富一些，有的村穷一些；有的村产量高，有的村产量低；有的村土地多，有的村土地少；有的村生产比較稳定，有的村自然灾害严重一些。現在把它們組織在一个集体經濟中，收益統一分配，就会出现一种收入水平平均化的情况。富村有些农民的收入减少了，穷村农民的收入增加比較多一些。因此，富村的农民就觉得自己吃了亏，不愿意和穷村农民在一个合作社里，提出要分社和退社等。据广东省韶关专区对開分社的三百五十九社的調查，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因为富村和穷村的矛盾而開分社的。这个矛盾，也反映着貧农社員和富裕中农的矛盾。

富村和穷村都是农民。富村农民所以富裕一些，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营条件好一些，而并不是因为剥削而富裕的。这是农民内部的矛盾。因此，处理这个矛盾，要采取有利团结、有利生产、统筹照顾、各得其所的方针。使富村和穷村团结起来，搞好生产，办好合作社。

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办法，是大力帮助穷村发展生产，使穷村的生产能够迅速赶上富村的水平。自然，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在穷村生产水平未赶上富村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实行“三包制”中，可以对富村的产量适当的包低一些，使他们得到较多的超额分益，不致减少收入。如果这样仍不能解决问题时，则可以变为联社，穷村富村各自成立分社，在联社的统一领导下，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己分配；分社只向联社交纳一定的公积金。如果有个别的社采用联社的办法也不能解决双方的矛盾，而合作社的规模又确属太大，村与村之间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悬殊很大，社没有办好，在社员坚决要求分社的情况下，也可以分社。

实行生产“三包制”以后，就可以基本消除生产队之间互不信任的矛盾。本位主义思想要依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集体主义觉悟水平来解决。

#### （四）社員和社員的矛盾

社員和社員的矛盾，主要是上中农和貧农、下中农之間的矛盾。其次还有劳动力多少、技术高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社員之間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因为誰剥削了誰，而是因为合作社在劳动安排上不够全面，工分定額上不够合理，分配上

缺乏明确照顧所致。在入社以前，上中农占有比較多比較好的生产資料，有比較充裕的生产資金，在某些方面的經營管理水平也比貧农高一些，因而保證了他們有比較富裕的收入和生活；入社以后，生产資料变成集体所有了，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在建社初期，許多上中农比入社以前减少了一些收入。因此，一部分上中农对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表示怀疑动摇，留恋过去，鬧着要退出合作社。貧农和下中农的情况則完全不同，他們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取得了土地和一些生产資料，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們畢竟是生产資料比較少和比較差，生产資金不足，在生产上和生活上仍然还有許多困难，随时有因遇到天灾病害而破产的危險；合作化帶給了他們希望，使他們永远地摆脱了穷根，生活开始走上了共同富裕。因此，他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合作化的依靠和核心。他們不滿意上中农对合作化的态度，經常和上中农斗争着。

上中农是富裕农民，他們羡慕資本主义的道路；上中农又是劳动者，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大勢所趋的情况下，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上中农也是我們的基本群众。貧农、下中农和上中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就应当用团结——批評——团结的方式来处理，互助互利，团结生产。要解决貧农和上中农的矛盾，根本的措施是合作社力爭尽快地赶上并且超过当地上中农原有的生产和收入水平。根据各地的經驗，合作社只要把工作做好，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般的合作社，大約有三、五年左右的时间是可以赶上和超过上中农的。提高合作社的生产水平，正确地貫徹全面發展生产的方針。

有重大的意义。粮食是全面發展生产的基础，因此必須首先發展粮食生产；在粮食問題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要積極开展多种經營副業生产，适当地發展一些經濟作物；粮食生产为發展畜牧業、家禽業解决飼料，畜牧業又为农業解决肥料。各种生产互相支援結合，全面發展。其次，在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則下，对上中农給予某些經濟上的照顧，以达到团結生产的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在不影响集体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留給社員5%左右的耕地作为自留地，作为社員的补充收入；在發展集体副業同时，鼓励并帮助社員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則下發展家庭副業，允許社員留下一些半劳动力从事家庭副業生产；处理好生产資料入社的折价还款和分紅問題；有特殊技术專長的，如在养魚、捕魚、养蚕、种植栽培經濟作物等方面有專長的，可以分配給他們專門的工作，給以比較优厚的劳动报酬；对于一些有比較好的經營生产經驗、特殊高产的农民，也可以用“特殊包产”的办法給以包产，以一般的产量包給他們負責耕种，超过包产部分的收获全部或大部分归他們自己。此外，对于上中农社員，必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他們怀疑合作化，留恋个体經營走資本主义道路的錯誤思想，开展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大辯論，指出只有合作化才是最优越最正确的道路，使富裕中农得到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劳动教育，指出只有積極参加合作社劳动，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批判和克服农民弃农經商进行商業投机的思想，采用各种必要的，限制資本主义活动的經濟措施，堵塞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漏洞。

• 解决劳动力多少、技术高低、农業劳动和非农業劳动社員

之間的矛盾的辦法，就是要貫徹統籌兼顧，逐戶安排，用其所長，各得其所的方針。使所有社員都有工作，都有收入，尽可能做到不減少收入甚至增加收入。因此，對於勞力少、人口多或者又無特長的困難戶，要給予妥善的安排，使他們不致於減少收入生活困難。可以多安排他們負責一些經常性的工作，如看牛、看管田水等，使他們多得一些勞動日；幫助他們發展家庭副業，幫助解決資金、種苗等方面的困難；有困難的軍、烈、工屬等，可以按照社章的規定，保留一定數量的土地報酬，在發生困難時，合作社用公益金給予必要的救濟等等。

對於合作社內的一些非農業勞動者，比如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和半漁半農的社員，也要給予恰當的安排。可以根據社會需要的情况，把一些行業，如理髮、縫紉、人力運輸、農產品加工、打鐵、編織竹器……等等部分地恢復起來。對社員中的手工業者、漁業生產者，要根據他們不同的技術情况，適當地提高勞動報酬。社員在社外進行經營手工業、漁業、人力運輸……等的，其本人不願意參加合作社統一分配的，可以允許他們獨立經營，自負盈虧，但他們的家屬，仍應給予一般社員的待遇。

### （五）社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矛盾

社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矛盾，這是合作社內部矛盾的集中表現，上面所述的社和社員矛盾，社和隊矛盾，隊和隊矛盾，社員和社員矛盾等等，都是與社干有關，這些矛盾的最后集中表現，就是社幹部和社員群眾之間的矛盾，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產生，是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同，社幹部處在領導者的地位，社員處在被領導者的地位。因此，他們

在对事情的看法和态度都会常常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矛盾。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民主和集中的問題，干部的作風問題。

我們广大的农業生产合作社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們对社会主义事業忠心耿耿，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是群众自己推选出来的。但也有不少的干部，比較普遍地缺乏民主作風，做事独断独行，强迫命令，有事不和群众商量，对老农不尊重，不总结推广老农的正确的經驗。总之，就是沒有按照社章办事，沒有走群众路綫。有些干部自己不参加生产，脱离群众，补助工分过多，财务賬目不公开，少数甚至贪污公共财产。因而，造成了群众的不滿。这种不滿积累發展起来，就容易造成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緊張起来，甚至因此鬧事、要求退社散伙。

解决社干部和社員的矛盾，关键是在于扩大民主，端正干部作風，正确地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当前的問題，主要是扩大民主的問題。在农業生产合作社里，往往同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不發揚民主来处理，群众就反对；發揚民主来处理，群众就滿意拥护。例如，广东省順德县有一个农業生产合作社，社里存有一千七百元，管理委员会想拿来买肥料下田，社員們知道了，就提出反对，要拿来全部分掉。管理委员会后来把这件事交給社員大家討論，說明道理，提出三个处理的意見給社員自己討論：一是全部拿来买肥料；二是全部拿来分給社員；三是一半买肥料，一半分給社員。最后，社員一致决定全部拿来买肥料。一样事情的处理，如果是社干部包办的，社員就会不滿意；如果是群众自己通过的，大家就会滿意。因此，就要实行民主办社。所

謂民主办社，就是說要依靠全体社員来办好合作社。民主办社，要有一套民主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很多的，主要的有下面的几个，第一，按期开好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凡是合作社的重要事情，如生产计划、财务计划、合作社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要由大会来討論批准；管理委员会和監察委员会要由大会来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和監察委员会，要定期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管理委员会是执行大会決議的日常的领导机关。規模比較大的社，为了要开好社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一般以三、四十人为好，人数过多了，就容易变成宣傳动員會議，不容易深入討論解決問題。代表中，要有貧农、下中农、上中农、青年、老农、妇女……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使代表会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要保証貧农和下中农占优势，以巩固貧农、下中农的领导。生产队也可以建立生产队代表大会的制度。第二，定期的召开一些老农座談会、專業會議和各种不同类型社員的座談会，作为社員代表大会的补充制度。总结吸收他們好的經驗，傾听各方面的批評和意見，密切各方面的联系。第三，实行“統一經營、社队分权、分級管理”制度。第四，财务賬目公开，实行财务民主体管理。在一定的時間内，如几个月或半年一次，請社員們推选代表从下而上来查对賬目，社干部則从上而下来查对賬目，互相审查，定期公布，消除贪污舞弊現象。

扩大民主，就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领导，使集中领导更好的建筑在發揚民主的基础上，使领导和群众血脉相通，紧密联系。只有有领导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领导，才是正确的。决不能把發揚民主認為是否定领导，否定集中，这就会变



成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主义建設成为幻灭。每个社員都应当服从領導，遵守劳动紀律。

其次，社干部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走群众路綫。这就要：精减合作社的脱产干部，适当降低社干部的工分补贴，中共中央規定社干部的补贴工分的总数，一般不超过全社总工分数的1%；脱产干部要参加生产，要規定一定比例的劳动工分是要从参加生产中取得的（有的地方規定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供参考）。深入到生产中去領導生产。

最后，在处理干部和社員的矛盾时，必須坚持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采用和风細雨的方式来解决問題，不要采取“殘酷斗争”“狂风暴雨”的方式，来一个大撤換。这样做就必然要大大地挫伤干部的積極性，不能达到干部和群众間新的团结。当然，有的人片面地强调“保护干部”，不敢發揚民主也是極錯誤的。正确地貫徹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实事求是，弄清是非，分清責任，解决问题，既看到社干部缺点的一面，也要看到社干部优点一面，这样，就不仅可以使社員滿意，而且又能够“保护”和教育提高干部。所謂用和风細雨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是說在發揚民主中，要以小組座談会或个别交談的方式为主，不要或少开大会批評，充分展开辯論說理，分清是非，大家共同揭露和解决问题。

## 五、手工業和農業、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單干農民的矛盾

### (一) 手工業和農業的矛盾

手工業合作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組織、原料供應、市場等問題方面。解決這方面的矛盾，要採取雙方兼顧，各得其所的方針。在組織問題方面，城、鄉的手工業者要根據自願的原則，分別組織專門的手工業合作社或者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鄉的手工業者，一般應該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城鎮的手工業者，一般應參加手工業合作社。原料和市場問題，可以由當地政府的有關主管部門，根據城鄉兼顧的原則，按照當地的歷史習慣，經過協商；統一起來分配原料和安排市場。

### (二) 農業合作社和退社戶、社外農民的矛盾

最後，談到合作社和退社戶、社外農民的矛盾。這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單干農民竭力想證明他們比合作社優越，來打倒社會主義。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些農業生產合作社對這些農民的歧視、排斥、打擊。在某些地區，這個矛盾鬧得相當尖銳，甚至鬧事打架，有的合作社不給退社農民耕牛、農具，給最壞最遠的土地；有的社不准社外農民走合作社的田邊經過，見面也不打招呼或者冷嘲熱諷，有的社甚至拒絕退社農民回到合作社來。要正確地處理這個矛盾，就是要

以社会主义去教育單干农民，使他們投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就要求农業生产合作社能够以社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外农民和退社农民，入社固然要欢迎，退社也不加歧視，要始終从团結出發，通过合作社事实的影响，和耐心說服教育，耐心地把他們团結到合作社里来。

对于單干农民的資本主义言行，却必須加以严格的批判，并且要做好管理工作，給予資本主义行为种种限制，如：

一，必須履行国家公粮、余粮和猪、油料等任务；

二，必須服从国家計劃指导进行生产，不得丢荒田地；

三，不得弃农經商，对于投机搶購，違犯市場管理者，依法处理；

四，必須履行国家义务劳动，如修水利、修公路、修建桥梁、造林、运送公粮等；

五，国家企業和公私合营企業需要招聘劳动力时，不吸收單干农民。

只有采用既积极教育又有限制的方針，才能使單干农民得到社会主义改造，并最后爭取單干戶自愿加入合作社中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论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作者 = 冯平著

页数 = 66

S S 号 = 11743157

出版日期 = 1958年02月第1版

## 前言

### 一、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 二、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 (一) 矛盾的主要表现

#### (二) 矛盾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 (三)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 三、国家和农业社的矛盾

#### (一) 国家计划指导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独立经营的矛盾

#### (二) 在分配方面的矛盾

#### (三) 在价格方面的矛盾

#### (四) 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矛盾

###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矛盾

#### (一) 合作社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矛盾

#### (二) 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矛盾

#### (三) 生产队和生产队的矛盾

#### (四) 社员和社员的矛盾

#### (五) 社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矛盾

### 五、手工业和农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单干农民的矛盾

#### (一) 手工业和农业的矛盾

#### (二) 农业合作社和退社户、社外农民的矛盾

盾